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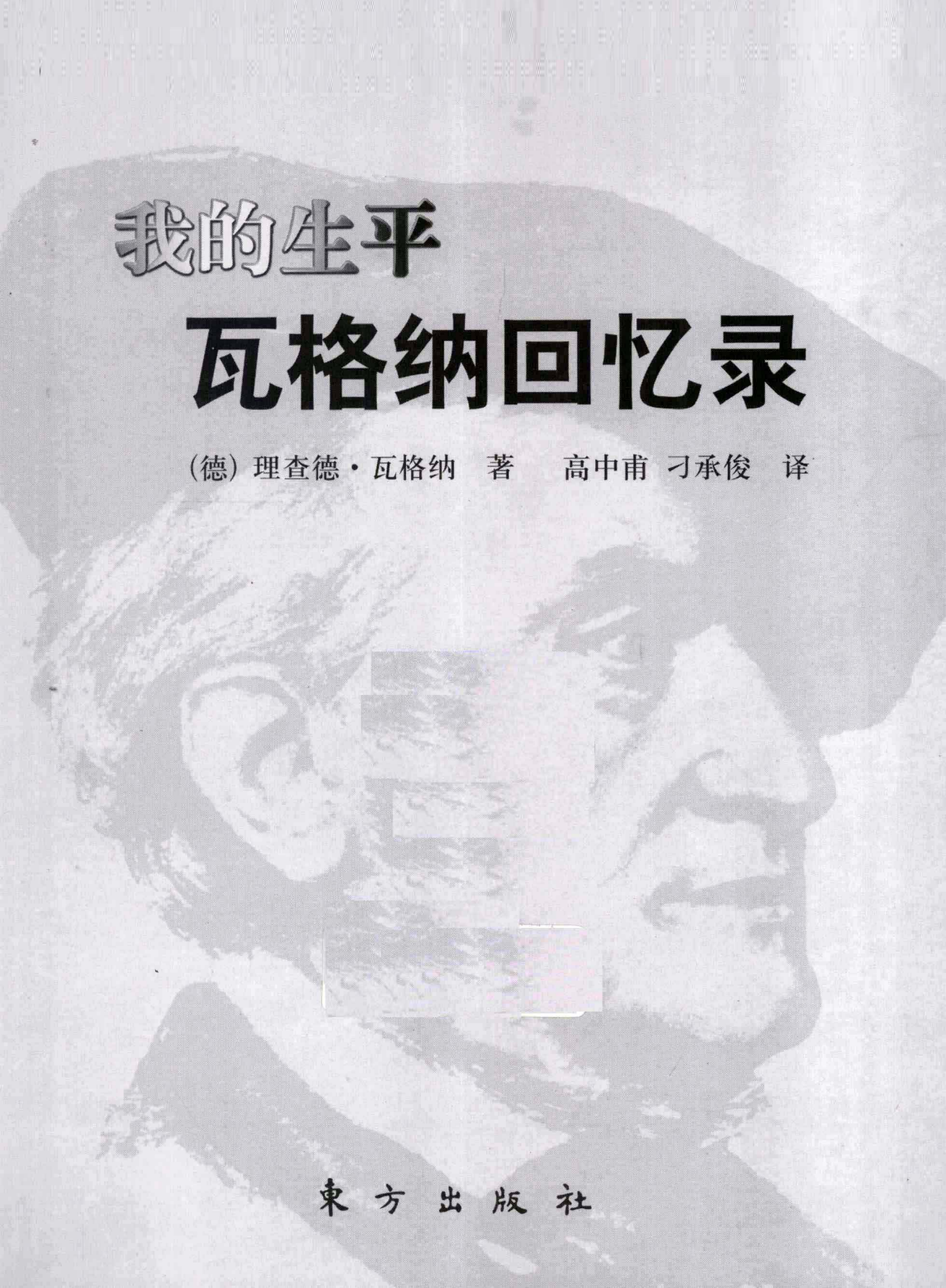
我的生平

瓦格纳回忆录

(德) 理查德·瓦格纳 著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東方出版社



我的生平

瓦格纳回忆录

(德) 理查德·瓦格纳 著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文字编辑:张 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生平:瓦格纳回忆录/(德)瓦格纳著;高中甫,刁承俊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

书名原文:Mein Leben

ISBN 978-7-5060-3387-9

I. 我… II. ①瓦…②高…③刁… III. 瓦格纳,W. R. (1813~1883)
-自传 IV. K38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2362号

我的生平:瓦格纳回忆录

WO DE SHENGPING; WAGENA HUIYILU

(德)瓦格纳 著 高中甫 刁承俊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7

字数:680千字

ISBN 978-7-5060-3387-9 定价:7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序言



瓦格纳于1865年7月6日开始向科西玛口述他的自传：《我的生平》。他写这部自传的缘起是由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的恩主，他的生活的救助者和艺术资助人流露出想了解他的生平的愿望。这是他写这部自传的主要原因，而非他日后在这部自传的前言中说的那样：是为了满足科西玛想知道他往昔的生活和经历的希望。这有瓦格纳在这一年7月21日致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信件为证，他在信中称他正在口授他的自传：“我的女友科西玛不停地提醒我关注我们国王对我流露出的愿望。”事实确也如此，还在5月18日，年轻的国王，瓦格纳音乐戏剧的崇拜者路德维希二世，他爱屋及乌，在一封致瓦格纳的信中写道：“要是您能为我把您的精神道路及外在生活详细地写出来该是多好！我可以希望我的这个请求有朝一日得到满足吗？”自1865年7月16日开始口授——这是瓦格纳与年轻国王结识近一年之后之事，几经中断，到1872年8月完成前两卷，1874年、1880年分别完成第三和第四卷，至此这部卷帙浩繁的自传最后杀青。《我的生平》的口授和修改直到定稿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瓦格纳除了歌剧创作之外，许多时间都用在这部自传上了。1867年2月，科西玛在致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像蚂蚁那样勤奋地写这部传记。”《我的生平》共分为四卷，篇幅庞大，洋洋洒洒，以译成中文计，近70万字。瓦格纳从他诞生的1813年一直写到1864年5月3日——这是他生活中也是他艺术生命中的一个好运的转折点的前夕。次日，5月4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秘书求见他，递上了国王邀请他去慕尼黑的邀请信，他决定应邀前往。自传到此结束。作为自传续篇的《年志》^①中，1864年的第一行就是“5月5日，拜访国王”。

在一部世界史中，古往今来，自罗马的奥列留·奥古斯汀起，在诸如《忏悔录》《回忆录》《我的生平》《我的生活》等各种名目下，自传性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知凡几；到近代来，那些下野或被黜的政治人物更是把自传这一形式当作自我粉饰、沽名钓誉、牟利赚钱的一种手段了。写自传当然不是为了自我消遣，自我欣赏，要藏之深山，而是为了发表。卢梭的《忏悔录》开宗明义就写道，他要把一个真实的人赤裸裸地摆在世人面前，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歌德写他的自传《诗与真》就是为了满足对他渴望了解的人的愿望。可是瓦格纳却称，如他在1866年1月3日致他的姐姐路易丝·布洛

^①《年志》从1864年5月一直记到1868年底。这部中译本没有收入。它的篇幅不长，如译成中文不足万字。



肯豪斯的信所写的：“当然这部口授的东西不是用来发表的，它也只是在我死后为那些要向世人描述我生平的人提供真实的支持。”这句话是抱有野心却又是欺人之谈的流露；后来，当他为这部完成了的自传写序言时，他又故做姿态地写道：“如果我们的后人还感到兴趣的话，那它可以公开出版，只是要在我死后一段时间方可。”1870年，瓦格纳自费印制了自传的第一卷，只印了15册，把它们分发给他的友人，这其中有李斯特、奥托·维森冬克、苏黎世的苏尔策，当然也有国王路德维希二世。1875年，前三卷只印了少数样书，他把其中一册附一个献词寄给了他的这位艺术庇护人，到1880年全书完成，同样只印制了有限的几册，其中一本送给了国王，完成了他的心愿。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在瓦格纳死后不久，科西玛却要求得到赠书的朋友把书寄回，就是国王也不例外。不知何故，或许是怕自传私下流传开来，会引起涉及当时在世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的不满和攻击，或者因为瓦格纳在《我的生平》中在某些事件上的撇清自己诿过于人的做法会被人诟病。反正这些只印了少数的样书大都被销毁了，以致在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相信这部自传的存在。实际上在拜洛伊特的瓦格纳资料馆至今还保存有两部完整的自传和一册原由李斯特保存下来的不完整的样书。这部自传确实在瓦格纳死后出版，可这已是在他死去18年之后的事了。但是1911年的版本由科西玛做了重大删节和改动，共有17处之多，在此后的1914年，1923年以及1933年的版本，都是不完整的，如瓦格纳的研究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指出：“所有随后出书的各种版本既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信的。”现在我们翻译时所据是1989年由美因茨-朔特，皮帕尔-慕尼黑出版社的版本，这部自传的出版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在后记中称：“这部完整的版本是以今天保存在拜洛伊特瓦格纳资料馆的笔录的手稿为准的。”

在这部卷帙浩繁的自传里，瓦格纳细致入微地，有些地方甚至是繁琐地描述了他童年直到1864年的生活和经历，他与音乐的结缘，他的创作，与他的人生和性格发生影响的几个女人在感情上的纠葛，他的艺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发展的道路。所有这些无疑是对后人提供了研究他和认识他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这部自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初叶直到60年代——这大体上相当于歌德时代的晚期到第二帝国建立前夕——德国的音乐生活，即使这种反映有局限性和片面性，那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乐坛的了解；尤为重要，它对这一时期的德国乃至欧洲音乐生活和音乐创作的叙述和评论以及对他本人的音乐戏剧作品的生成和阐释，都为这幅音乐社会的巨幅画面涂上浓抹重彩的一笔。这就使《我的生平》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更由于瓦格纳在乐坛上所处的地位，如音乐史家保罗·朗格所称，他是浪漫主义时期

“具有代表性，最完善的大师”^①，这就保证这部自传在音乐文化史上的意义。

在瓦格纳所生活的时代，德国以及欧洲的音乐天空群星灿烂，竞相争奇斗艳；他童年时，贝多芬、舒伯特尚在世，而诸如门德尔松、舒曼、麦耶贝尔、马斯内、马施纳、斯蓬蒂尼、肖邦、比才、伯辽兹、罗西尼、威尔第、布鲁克纳等一大批世界级音乐家都与其有着交往，有的甚至是他的至交好友。瓦格纳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赋予音乐以更深的思想内涵，他在音乐戏剧上所进行的改革使他在这群灿烂的星座中闪烁着异样的夺目光辉，影响遍及欧洲。如果说贝多芬主宰了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乐坛，那瓦格纳无疑是这一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音乐戏剧的领袖人物。



人们都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写自己的自传是最轻而易举之事了，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呢？歌德在他的自传《诗与真》的自序中谈到，传记的任务就是“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反映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者作家又怎样把它们反映出来。”^②一个为他人作传的作者不仅无法正确无误地认识传主所处的时代，无法准确理解传主的经历遭际，这就难以准确地描述其精神发展的轨迹和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而更由于写作者本人的偏见和局限性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褒贬上的失当，评价和立论上的谬误；若是自己为自己写作，那完成歌德所确定的任务就尤其困难。因为，如卢梭所说，那些写自传的人，都是以写自己的一生为名，实际上都是在为自己辩解。从古至今没有一位自传作者会毫无保留地说真话，把自己一生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如实地写出来。深谙个中底蕴的卢梭写道：“最诚实的人所说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保留不说的部分就是说谎。他们沉默不语竟会这样改变了他们假意要供认的事，以至于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相时也等于他们什么都没有说。”^③这段话确实入木三分。斯·茨威格是一个写传记的大家，他在《三作家》一书的序言中曾就自传这一体裁做过详尽而深刻的论述，他称写自传是作家一种特别英勇的行为，需要难得一见的勇气，要求每一个自我描述者表现出坦诚的英雄主义。然而由于人先天存在的弱点和后天形成的弊病，就难得一见这样的大智大勇的作家，能成功地如实地描述出自己肖像的人太寥寥无几了。即使在罕见的成功之作中，也存在着如茨威格所指出的，“还有多少遗漏和缝隙，还有多少做作性的补充和不自然的掩饰呀！”^④人想如实地自我观察，真实地自我描述时，立即就会产生出一种

^① 保罗·朗格：《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史》，第19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② 《歌德自传》，刘思慕译，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 卢梭：《忏悔录》，第二卷，第824页，远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④ 茨威格：《世界建筑师》，申文林译，高中甫校，第320页，燕山出版社。



强烈的相反的愿望：隐而不露他的那些丑恶的秘密，他的见不得人的弊病，他的贻笑大方的浅薄，舍弃或者粉饰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他们所做的几乎就是自我辩解或自我美化了。

瓦格纳的自传《我的生平》也无法超越大多数自传的局限性，他本人也难以克服绝大多数自传作者无法摆脱的弱点。《我的生平》不乏文化历史的价值，为了解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乃至欧洲的音乐生活做出了贡献，它也在资料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它决不是如瓦格纳在前言中所夸口的那样：“这部自传的价值在于它不加任何粉饰的真实性。”公允而论，瓦格纳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所谈论的，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涉及他的人品，那大都是真实的，他愿意把它们如实地展示出来。可一当他面对要害问题时，他便自觉不自觉地掩饰，刻意遮蔽，甚至诿过于人，为自己辩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1849年德累斯顿武装起义时的态度和他与一些女性交往两个重大的问题上。

在《我的生平》的第二卷最后部分，他叙述了他在德国1849年5月德累斯顿武装起义时期的活动和经历。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好奇者，一个旁观者，一个被煽动起搅进这场革命运动的人。可事实上，他是一个狂热的革命鼓动者，积极的参加者，是这场武装起义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成员。他在这场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言论、行动以及同时代人提供的资料都确凿地提供了佐证。这里我摘引在德累斯顿武装起义前夕，1849年4月8日他匿名发表在德累斯顿《人民报》上一篇题为《革命》的文章中的一段，他写道：“我要从基础上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秩序，因为这个秩序是罪恶的萌芽，它的花朵就是灾难，它的果实就是罪行；但种子已经成熟，我就是砍伐者。我要摧毁独夫对万人的主宰，死者对活人的统治，物质对精神的控制；我要粉碎强者的暴力，法律和财富的暴力……我要摧毁现存的秩序，这个秩序把统一的人类划分成敌对的民族，划分成强者和弱者，划分成特权的人和无权的人，划分成富人和穷人。我们要摧毁把成千上万人变成少数人的奴隶的秩序。”这是一篇多么富有煽动性的鼓吹革命的文章，能说写这样文章的人是这场革命的旁观者吗？这里再援引克拉拉·舒曼在她日记中的一段话，她那时居住在德累斯顿，是这场武装起义的目击者：“乐队长瓦格纳也在共和主义者那里起了作用，按照他的指示修起了街垒，还做了另外一些事情。”能说发出这样指示的人不是这场武装起义的一个积极参加者吗？瓦格纳的研究者，《我的生平》校勘本的出版者马丁·格莱戈尔-德林在这部自传的后记中写道：“人们从《我的生平》中所获得瓦格纳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思想和活动的图像都是不完整的。”著名学者汉斯·马耶尔在《瓦格纳》一书径直写道：“《我的生平》中的辩解都

是靠不住的。”^①这样的观点已在学术界和瓦格纳的研究者那里得到了认同。

在瓦格纳一生中可说是绯闻不断，名声不佳。狄特尔·大卫·硕尔茨在1997年出版的《一种德意志式的误解》一书中写道：“瓦格纳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作是‘好色之徒和卡萨诺瓦’”，其他一处还有这样的文字：“伴随瓦格纳一生直到高龄的是轻佻、放荡、好色和不忠的名声。”^②在叙述到1864年为止的《我的生平》中，瓦格纳多次谈到了他与一些女人的关系，可他在这类事情上缺乏歌德在自传中所表现出的忏悔和内疚，缺少卢梭在《忏悔录》中的坦诚和悔恨，他也没有卡萨诺瓦在他的《我的一生》中的坦率和勇气。在与他的妻子明娜的纠葛中，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辜者；在与杰茜的关系上，他明明是一个引诱者，可却把她写成一个耽入空想的无知少妇，自己倒成了被引诱者；他称玛蒂尔德·维森冬克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所爱的人，可他在这部自传却不敢承认他对她的感情；他曾在一封信里称他与弗里德利克·麦耶尔有过肌肤之亲，可在自传中他却没有勇气供认。卢梭在为他的《忏悔录》的纳内泰尔手稿本序言中写道：那些写自传的人“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③信哉斯言。

政治运动和两性关系是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情操和品德的两个领域了。瓦格纳在写自传的过程中恰恰在这两点上丧失了一个正直艺术家的勇气。当然我们后世不能因此而忽视和贬抑这部著作应有的价值。托马斯·曼在他那篇著名文章《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和伟大》一文中写道：“理查德·瓦格纳的精神形象就伫立在我的面前，它经历苦难而又伟大，像他那个世纪一样，它是19世纪的完美表现……他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饱经苦难的，热狂的和蒙受误解的，注入世界荣耀的……”他在文章中继而写道：“瓦格纳的艺术是德意志最本质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描述和自我批判，它让人思考，而热心研究瓦格纳艺术，同时就是热心研究德意志本性本身，这种艺术就是用批判-美化的方式去颂扬德意志本性。”^④这两段话充分表明了瓦格纳本人和他的艺术在德国的重要性，他主宰了19世纪德国的音乐戏剧，并把他的影响扩展到德国之外。他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音乐戏剧家，音乐思想家，他的伟大和苦难，他备受推崇备受责难，追随者狂热，批判者激烈，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而且也成为后代的一个重大的和长久的研究对象。这一切都保证了《我的生平》的巨大价值。

^① 汉斯·马耶尔：《瓦格纳》，第91页，张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② 狄·大卫·硕尔茨：《一种德意志式的误解》，第39页，Parthas出版社。

^③ 卢梭：《忏悔录》第二卷附录，第813页，远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④ 转引自汉·马耶尔：《瓦格纳》，第286页，张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译文稍有改动。





谈到瓦格纳这部自传，我与它确实还有点缘分呢。记得是在1965年吧，一家音乐出版社找到我要我翻译瓦格纳的自传《我的生平》，只是第一卷，想是其他几卷找了另外的人承担。我当时不知深浅，贸然地答应下来。那个时候，在我所在的单位，翻译点东西是属于不务正业的勾当，被人知道就要扣上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我只能私下里在业余时间进行。为了能如期交出译稿，我找了我的朋友分担一部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人们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但我毕竟争分夺秒，不辞劳苦，完成了我这部分的初译稿。可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是场名为文化革命实为绞杀包括文化在内的浩劫。我付出的辛劳化为乌有。那场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后，我被调到能学以致用外语学院。我喜爱德语文学，这是我的专业，我也喜爱德奥音乐，这是我的所爱。在那段时间我先后翻译了关于《莫扎特》、《贝多芬》的小说，《马勒》的评传，也就在这段时间我翻译了瓦格纳的一篇小说《朝拜贝多芬》。90年代末期，由刘雪枫先生倡议，我与张黎先生组织翻译了《瓦格纳戏剧全集》。在莫扎特、贝多芬之后，瓦格纳是另一个激起我兴趣的伟大音乐家。在几次访问德国时，我都要在书店里、在跳蚤市场里搜寻有关德奥音乐家的作品，我曾几次欲购瓦格纳的自传而未果。我那时内心就潜存有这样一个愿望：退休之后，利用几年时间，安静地把这本自传翻译出来，这既是一种消闲，也算是完成自己早年的一个心愿。正因有这样一种想法，当出版社的同志约我翻译此书时，我自然乐于应承下来。在结束了另一项任务之后我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完成了第一卷的翻译，约18万字。可就在这一年的5月我因病住院，并做了心脏手术，这使工作停顿下来。为了能在2006年交稿，我只得恳请朋友来分担一部分，蒙刁承俊先生的应允，他在繁忙之际，承担了自传的第三和第四卷的翻译工作。这样到2007年初，我译完了第二卷，承俊先生译毕第三、第四两卷，全书最终完成。当我把译稿交给出版社时，确实感到有如卸下了压在心头的一个负担的那种快乐和高兴。

最后我还要赘言数语：瓦格纳这部自传是他口授，由他当时的情人，1870年才正式结婚的科西玛（即李斯特之女，原系汉斯·封·比罗之妻）笔录，经他修改而成的。瓦格纳的文字本来就令人感到晦涩，尼采就常为瓦格纳的文字皱眉；这部自传，由于当时口授者、笔录者的心态和处境，鉴于种种情况使用了委婉的方式，选择了隐晦的用语，甚至是谜一般的表达，奇怪而奇怪的遣词用字，这更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科西玛在1871年6月致尼采的信中称，印制这本书的出版人朋方梯尼斯对瓦格纳的语言大为摇头。我和刁承俊先生在翻译上也不算是新手了，都还积累了一些经验，可我们在这本

书的翻译过程中却有力拙之感。当我们终于把它完成时，都吁出了一口长气，总算是卸下了一个自愿背下的重负。至于译文的质量，虽然我们尽力了，但由于我们中外文方面的功力不足，知识面的缺欠，错讹之处恐难以避免，这有望读者指正。这是附带说明，个别地方我们参照了安德列·格雷的英译本，这个译本应当说还是忠实的，但是很多地方做了简明的处理。



瓦格纳的《我的生平》由于篇幅长和文字上的难度，直到目前都还没有翻译过来，甚至从英文转译过来的译本都还没有。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这个全译本来弥补这个空白，为音乐界和瓦格纳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些有益的帮助。

高中甫

2007年8月29日



前言

这本由四个部分组成的传记都是由我的夫人——她希望我讲述我的生平——在不同年代根据我的口授直接记录下来的。我们两人有了这样的愿望：我们的家庭以及忠实的朋友能保存这些谈及我生平的资料。为了防止这唯一一份手稿失落，因此我们决定，我们自费出版印制极少的样书。这部自传的价值在于它不加任何粉饰的真实性，在所描述的环境里，就是这种真实性，使我的这本书有了唯一的一种意义，因此我提到的名字和数字必然也都是准确的，如果我们的后人还感到兴趣的话，那它可以公开出版，只是要在我死后一段时间方可；这是我为我的继承人所留下的遗嘱。相反地，如果我们现在就不拒绝个别可信赖的朋友看到这部传记的话，那其前提是出之于对事情本身的关心和同情，即使这或许也会对他们是一种冒犯，进一步地传播，那这种前提是得不到保证的。

理查德·瓦格纳



目 录

第一部 (1813-1842)	1
第二部 (1842-1850)	162
第三部 (1850-1861)	332
第四部	507



第一部 (1813-1842)

我于1813年5月22日生于莱比锡布鲁尔区的“红白狮”楼的三层楼上，两天后在托马斯教堂受洗，取名威廉·理查德。我的父亲弗里德利希·瓦格纳在我诞生时是莱比锡警察局的官员，有望得到警察局长的职位；他在莱比锡会战的兵荒马乱期间工作繁重，心力交瘁，传染上当时流行的疾病：斑疹伤寒，在我降生的这一年10月故去。我后来才知道些我的祖父的事情。他是朗斯台特城门的税收员，家境贫苦，他因使他的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在他的同事中间受到敬重；他让他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弗里德利希攻读法学，而小儿子阿道夫研究神学。我的叔叔对我的发展起了不是无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我将在讲述我青年时代发展的决定时期还要谈及。有关我过早逝世的父亲，我后来才知道，他十分热衷于诗歌和文学，特别是对受到教养阶层经常光临的剧院有着一一种几乎是狂热的激情。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曾与她一道前往劳赫斯塔特去观看《麦西娜的新娘》^①的首场演出，在那儿的林荫道上对她大谈席勒和歌德，并因为她对这样伟大人物的无知而激烈地责备她。他本人已经陷入对剧院女艺术家的狂热之中。我的母亲开玩笑地抱怨说，她在午饭时得长时间等他，而这期间他却去拜访当时一个著名的女演员。面对她的责备，他言之凿凿，说是去交易所耽误了回家，并用沾满了墨汁的手指作证，可强使他伸出手指做进一步检查时却发现非常干净。此外，他对戏剧的巨大热情使他结交了一位知己好友：路德维希·盖尔。如果说主要是出于对戏剧的热爱而与这个朋友成为至交的话，那他同时也使这个朋友成为他家庭的最最高尚的恩人：这位谦逊的艺术家在他的朋友瓦格纳意外过早辞世之后热心地关怀其一大家人的命运，并把他的下半生都倾注在他们的生活和教育上了。在警察局官员瓦格纳在剧院里度过他的夜晚期间，这位出色的演员多半时间取代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看来他经常是使抱怨丈夫轻浮的家庭主妇得到了慰藉。这位无家可归，生活艰辛，颠沛流离的艺术家是如何渴求在一个富同情心的家庭中得到温暖，这从下面的事情上得到证实：他在他的朋友瓦格纳死后一年就与其遗孀结为夫妇，成了留下的七个孩子的任劳任怨的父亲。这

^① 此系席勒的一部戏剧。



种困难的处境却意外地使他的地位大为改观。这位被称之为是性格演员的艺术家在新建的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得到了一个有利的、体面的和长期的职位。早年他因家境贫困不得不中断大学学习，那时他的绘画才能帮他维持了生活，现在他的这种才能在德累斯顿的职位上重新得到了重视，尽管他抱怨说，绘画使他失去了一种系统的、严格的教育；但他杰出的肖像画画得惟肖惟妙的才能给他带来了重要的订单，这使他作为画家和演员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以致遗憾地过早精疲力竭。有一次他在慕尼黑受到邀请参加一次客座演出，由于萨克森宫廷的极力推荐而从巴伐利亚宫廷接受一项重要的委托：为国王一家画肖像画，这使他不得不中断他的客座演出并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他也富有诗歌才能；他经常写一些华丽的即兴诗，他也写了不少喜剧，其中一部是《伯利恒的幼儿大屠杀》，用亚历山大韵文体写成，经常被演出，也印刷出版，并受到歌德的极为友好的称赞。在我两岁时，在这个杰出的人的主持下，我的家庭迁往德累斯顿，他与我的母亲还生了一个女儿（塞茜利），他怀着极大的关怀和爱也承担了我的教育责任。他希望我完全成为他自己的儿子，因此我在上第一个学校时就姓了他的姓，这样我在我的德累斯顿少年伙伴中，直到14岁时留下的是里查德·盖尔这个名字。在我的继父死去多年以后，直到我的家重新搬回莱比锡，我才重新恢复了我的原来姓氏：瓦格纳。

我最早的少年回忆总是想到我的继父，是他把我引向戏剧。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父亲希望我在绘画才能上能有所发展。他的工作室里摆着画架，上面挂着绘画，这对我不会没有影响的；我记得我怀着孩子般的热情试着去摹画萨克森国王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的一幅肖像；但是从这种幼稚的涂抹乱画本应朝严肃正经的绘画发展的时候，我却无法坚持下来，也许这是因为我的教师（他是我一个乏味的表哥）的死板画风所致。在我孱弱的孩提时代由于患了一种发育上的疾病而变得十分憔悴，我的母亲后来曾告诉我，因为我已无可救药了，几乎希望我死掉算了，但令我的双亲惊喜的是我活了过来。在这种事上，我知道了我那高尚的继父对我是怎么样的关怀备至，尽管一家人都忧虑苦恼，可他从不灰心，从不放弃我会好起来的希望。一股强大的力量把我的幻想引向剧院，我不仅是作为一个儿童观众被领进剧院，从秘密包厢的通道到舞台的后方，不仅仅是通过参观化装室而熟悉它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服装和移动的设备，而且也自己去参加演出。在我惊讶地看到父亲在《孤儿和凶手》《两个橹舰奴隶》以及类似的戏剧中饰演的坏蛋角色之后，有几次我自己参加了喜剧演出。为欢迎被俘虏的萨克森国王归来演出了一部即兴剧《易北河畔的葡萄园》，由乐队长卡尔·玛丽亚·封·韦伯配乐，我记得在一个活动的场景里，我扮作一个天使，整个身子都裹在针织紧身衣里，背上插

着两个翅膀，做出很难受可却是优美的姿势。我也记得，在这个场合里，答应给我一个糖块，并且是国王本人亲自给我订做的。最后我还记得，自己在柯茨布的《厌世和悔恨》中出演了一个只有几句台词的儿童角色；由于我没有完成学校的作业，于是这个角色就成为我工作繁重的借口，我声称我在《出格的人》中要扮演一个大角色，得背诵台词。



与此不同，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是极为严肃认真的，在我完成了六年的学业之后他把我带到了乡下——德累斯顿郊区的波森多夫——的一个牧师那里，我应当在这儿与另外一些出身名门的孩子接受一种出色的、严肃的和健康的教育。我对世界的某些最初印象就产生在这次短暂的停留期间：晚上牧师给我们讲述鲁滨逊的故事，并进行有益的讨论。在朗诵一部莫扎特的传记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报刊登载当时发生的希腊解放斗争的事件使我异常激动。我对希腊的爱起源于对发生在当前事件的热情而痛苦的关怀，它日后使我怀着热情拜倒在古希腊的神话和历史的门前。我记得在稍后的年代，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起义^①给我的印象总是在希腊人反对波斯人的斗争中再度浮现出来。

在这个乡村待了将近一年，有一天从城里来了一个送信人，他通知牧师，他要把我领回到德累斯顿家中，因为我的父亲病危。我们步行三个小时赶回，到家时已经疲惫不堪，我吃惊地看到母亲泪流满面。翌日，我被领到我父亲的床边，他同我说话时的羸弱，对严重胸部积水所做的最后的绝望处置，我感到他就像一个梦幻中的人一样。我相信，就是这种充满恐惧的惊讶强烈地攫住我，我都不能哭出声来。母亲把我领到毗邻的一间房间里，要我展示一下，我在钢琴上都学到了些什么，让父亲听听开心，我弹了《永远忠贞和诚实》。父亲问母亲：“他有些音乐才能吧？”翌日清晨，天刚一破晓，母亲就进入孩子们的睡房，走到每一个孩子的床前，抽泣地告知父亲已经去世；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祈福般地说了句关于父亲的话，她对我说：“他要你成个有出息的人。”下午魏采尔神父来了，他把我重新接到乡下。我们又是徒步，直到夜色朦胧时才到达波森多夫；半路上我问他许多关于星星的事情，他给了我一些这方面的初步知识，八天后我死去的继父的兄弟出现了，他来自埃斯雷本，是为了参加葬礼。他许诺尽全力来维持这个又陷入无助的家庭，并继续承担起我的教育责任。我告别了我少年时代的伙伴，告别了和蔼可亲的神父，几年之后为了参加他本人的葬礼，我又一次回到波森多夫；多年以后，在一次出游时我又一次拜访过这个村庄；那时我作为德累斯顿的乐队长经常徒步到乡间游览，使我激动的是，再也找不到陈旧的神父的住房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非常现代

^① 此系指发生在 1821-1832 年的希腊独立战争。



的建筑，它令我扫兴，此后我在出游时就再也不到这个地区来了。

我的叔叔这次把我用车带回到德累斯顿；我看到母亲和姐妹们都身穿丧服，我记起来，我这是第一次感受到与我家惯有的那种熟悉的温情不一样的情景，并在几天之后又重被带走：我的叔叔把我带到埃斯雷本。我继父的小弟弟定居在那里，是个金匠；我的一个哥哥（尤利乌斯）已经做了他的学徒。他是一个单身汉，年老的祖母也与他生活在一起。这个老女人已经去日无多，人们一直没有把她大儿子之死相告；我也被告知不要泄露此事。女仆细心地把我的衣服上的黑纱摘了下来并解释说，若是祖母发现了，那她很快就要死去的。我得经常跟祖母讲述父亲的事情；隐瞒继父之死，这事并不使我为难，因为我本人也不甚了了。她住在一间黑暗的后屋里，外边是一个狭小的庭院，她喜欢红喉雀在她四周飞来飞去，经常在炉旁为它们摆出些新鲜的绿色树枝。有一次我成功地用罩子给她捉住了几只，若不有几只老的就会被猫捉住弄死的。她对此非常高兴，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不久就去世了，省下来的那块黑纱可以在埃斯雷本公开地戴上了。这间有着红喉雀和绿树枝叶的后屋就从此与我无关了。这座房子属于一家制造肥皂的人，我不久就博得这家人的欢心，我给他们讲述我的故事。我被送进一个私人学校，它的校长魏斯给我一个严肃和高贵的印象。50年代末我在一份音乐报上非常感动地读到一个关于在埃斯雷本举行的一次音乐演出时上演了《汤豪塞》选段的消息，我那时的这位校长没有忘记他的学生，亲自出席了这次演出。

马丁·路德的故居就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小城里，对他居住此地的种种回忆一直到暮年还经常一再在梦中浮现出来。我总是—再地渴望再次去拜访这座城市，去证实我的回忆是如何清晰可靠，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们住在市集旁边，这使我能经常接触到独特的演出，一个杂技团的演出：走过悬在广场两端的绳索，很长一段时间使我对类似的节目着迷，我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庭院里竖起木桩，挂上绷紧的绳子，拿起一根平衡用的木杆，在上面灵活地动来动去。直到现在我依然对运用杂技用具有着浓烈的兴趣。对我最重要的是在埃斯雷本军营中的一支轻骑兵的铜管乐队的音乐。他们经常演奏的一支曲子当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令我感到好奇：这是《魔弹射手》中的“猎人合唱”，这部歌剧已经在柏林上演过了。叔叔和哥哥热心地向我问起了这位作曲家，在德累斯顿我在家里见到过担任乐队长的韦伯。就在同时在一个朋友家里由一群女孩热情地演唱了韦伯的《处女花冠》。这两个曲子使我对伊普西兰提^①——华尔兹产生了偏爱，直到今天我都把这首曲子看作是最奇妙的声乐作品。我记得我同当地的孩

^① 伊普西兰提·亚历山大（1792-1828）：希腊自由战士，领导希腊人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

子打过多次架，用我的四角帽去嘲笑他们去刺激他们。除此在我的记忆里还出现了攀登乌斯特河岸巉岩峭壁的冒险之旅的画面。

我的叔叔终于结婚了，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这为他和我的家庭关系也带来了强烈的变化。一年之后他把我带到莱比锡，有几天的时间他把我交给了我生父的亲戚：我的叔叔阿道夫·瓦格纳和我的姑姑弗里德里克·瓦格纳。我的叔叔阿道夫·瓦格纳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后来一直对我有着影响。他这儿的特殊环境从现在开始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回忆里。他与我的姑姑都与一个奇怪的老处女扬内特·托梅保持着非常亲近的友好关系，托梅是市集旁这幢大房子的共有者，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自从萨克森公爵强大的奥古斯特家族时代以来，这幢三层高的楼房就是为他们在莱比锡停留时租下装修起来的。就我所知，第三层归扬内特·托梅个人所有，她只住在内朝庭院的一套不显眼的房间。因为国王一年顶多只有几天利用他租下来的这些房间，于是扬内特·托梅和她的家人便占用了这些租下来的富丽堂皇房间，而其中一间豪华的便成了我的睡房。这些房间的设备还都是强大的奥古斯特时代的，沉甸甸的丝绸料子和各式各样的罗克克——家具，华丽高贵，都已用了有些年头了。在这些巨大的引人遐想的房间里令我最为满意的是，能从这儿望到活跃的莱比锡市集广场，在人群中间令我特别着迷的是那些身穿古德意志学生协会服装的大学生们，他们成群结队熙来攘往。只是这些房间里有一个装饰物让我十分苦恼：这就是那些各式各样的肖像画，高贵的夫人身着钟式裙，面孔充满朝气，而头发却是扑上了白粉。我觉得这完全是些妖魔，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时，她们就好像活了起来似的，使我恐惧万分。睡在这样一个偏僻的房间里，躺在这样一张老式的华丽床上，近旁有这么些阴森可怕的画像，这令我毛骨悚然。虽然我在姑妈面前，每当她晚间拿着一盏灯送我去睡觉时，我都掩饰起我的恐惧。可每一个夜里我无不被这些可怕的妖魔幻像吓得汗流浹背。

这座楼房三个主要住客的性格特别适合把我这次停留所引发的幽灵般印象转化为童话般稀奇古怪的故事：扬内特·托梅非常矮小肥胖，戴着泰特斯^①假发，并为有这种往昔的打扮而感到得意。她的忠实女友和护理她的人就是我的姑妈，她同样成了一个老处女，身材修长瘦削，她那通常非常亲切的面庞由于一副特别尖削的下巴更显得古怪，我叔叔阿道夫在庭院的一个阴暗小屋里有着自己的一间书房。我在那儿头一次遇见他时，他埋身在书的巨大沙漠之中，身穿一套不显眼的衣服，戴着一顶高高的尖头皮帽，那个样子就像我在埃斯雷本的演绳技杂团中看到的滑稽小丑。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巨大愿望把他逼进这个奇怪的避难所里，他先是被学神学，但不久他就放弃了，转而

^① 泰特斯：古罗马皇帝，他留有短发。

